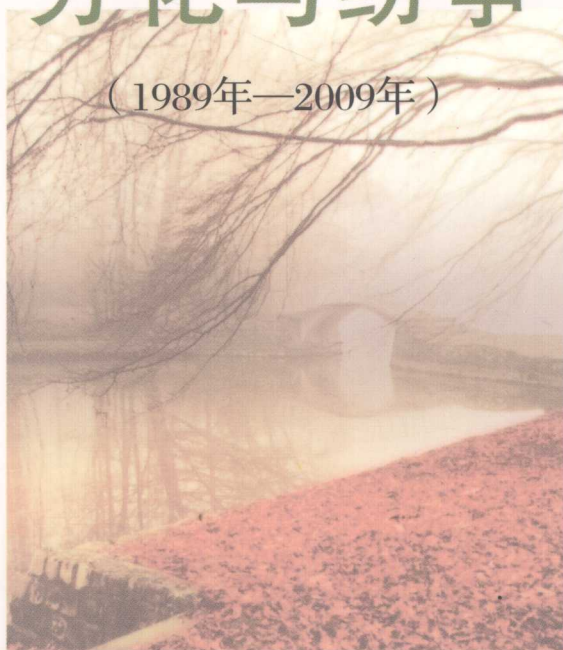


Zhongguo shige de
fenhua yu fenzheng

中国诗歌的 分化与纷争

(1989年—2009年)



周 航◎著



人 民 出 版 社

C14035816

I207.25

45

长江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国诗歌的 分化与纷争

(1989年—2009年)



周 航◎著



北航

C1723111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高晓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的分化与纷争(1989年—2009年)/周航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3131-3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1989—2009 IV. ①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8180号

中国诗歌的分化与纷争(1989年—2009年)

ZHONGGUO SHIGE DE FENHUA YU FENZHENG(1989 NIAN—2009 NIAN)

周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40千字

ISBN 978-7-01-013131-3 定价:4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周航的博士论文《中国诗歌的分化与纷争（1989年—2009年）》即将付梓，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至少，这部书的出版是对他2007年至2010年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付出心血的见证和交代。身为导师，学生嘱我写序，我是难以拒绝也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论文原题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研究——以“盘峰论争”为中心》，周航告诉我人民出版社有意出版，我就与他一道结合出版社的意见商量再三后最终定下目前这个书名。

2007年、2008年之交，北师大文学院着手编撰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周航是其中的编撰者之一。接受任务之后，周航在国家图书馆待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查阅了数千册图书资料，其中甘苦想必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他所查阅的资料与当代诗歌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后来，他与我在讨论博士论文开题时，表示出对当代诗歌论争的兴趣。在学校和我家中，他与我数度讨论，最后确定以“盘峰论争”为中心来展开对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研究。他的论文写得十分艰难，在我看来：一是因为他并非科班出身，所受的正规学术训练有限，让他一下子操作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我不得不担忧；二是他的论文资料性很强，需要查找大量原始资料，这就需要很强的学术甄别能力和高超的学术概括能力，这方面也是我所担心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周航最终完成了30余万字的博论写作，而且还顺利通过了答辩并得到了张健教授、张柠教授、李怡教授、程光炜教授、陈晓明教授等多位校内外专家的好评。

对周航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我曾作如此评价：“周航的论文《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研究——以“盘峰论争”为中心》以较为开阔的历史和学术视野，展开了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历史演变与内部观念的讨论，其中涉及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现象十分复杂，所涉及的诗歌写作事件与文本内容也尤为庞杂，但周航以较为合理的框架和角度对这些问题与现象作了有效的归纳与处理，理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精神主线和历史走向。虽然论文尚存在某些粗疏与问题，但总体上工作量大，内容充实，分量较为厚重，为当代诗歌历史与诗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人大的程光炜教授是周航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他当时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论文涉及大量原始资料，对纷繁复杂且错综交叉的诸多现象做了有效归纳和诠释，

对目前过于表面化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成果，对90年代以来诗歌历史与诗学观念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大诗歌现象与观念的历史生成及来龙去脉的研究，尤为细致。论文观点明确，论述层次清晰，材料丰富，体现了作者良好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略嫌不足之处在于，对材料的处理还不够精当，某些论述缺少个人的独到见解。总体上，这是一篇比较扎实厚重的论文。”这些是对周航在北师大三年学术生涯的最大肯定，同时这也是他走上学术之路正式迈开的第一步。

就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绪论、90年代的转折与诗歌观念的变异、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流变、“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研究、“民间写作”观念研究、世纪之交以来诗歌观念的多元状况。具体而言，第一，大致梳理了“盘峰论争”的“过去”、“此刻”与“未来”，重点指出了论争有其必然的根源与其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第二，论述了90年代断裂、转折的诗歌现状与诗歌观念变异的事实。讨论了此时期诗歌观念的转化、诗歌界对此时期观念变化的研究现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若干观念趋向、总体梳理当时所出现的几种代表性的观念流向与形态。这是对90年代诗歌观念格局的统摄性研究。其中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民间写作”观念是如何从“知识分子写作”中分化出来的。第三，按不同时期来考察、分析90年代诗歌观念的流变。第四，对“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观念的研究，包括：“知识分子写作”的前史、该观念提出与形成的过程、“盘峰论争”之前的代表性观点、论争之后的代表性观点。第五，“民间写作”诗歌观念的研究，包括：“民间写作”的前史、其观念提出与形成的过程、“盘峰论争”之前的代表性观点、论争之后的代表性观点；第六，综合论述了世纪之交以来诗歌观念的多元状况，包括：“盘峰论争”中的焦点问题及引发大讨论的情形、“70后”诗歌观念的浮出、“民间写作”的延伸与扩散，其中包括网络诗歌美学与“眼球经济”的介入与“低诗歌运动”，等等。

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作为学术研究专著，我们还需看到其研究的有效性，也即其研究意义。本书以“盘峰论争”为中心发散式地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内部的演进与分化的脉络，重点关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诗歌观念的来龙去脉，同时兼顾其他诗歌观念并存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盘峰论争”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的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敞开一段有效的诗歌历史。总之，其理论价值体现为：试图透过90年代以来丰富的诗歌现象与理论争锋来讨论当代诗歌观念的转折和变异，揭示其复杂的构成和特征，是对目前过于表面化的研究现状洞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它既是新视野下的研究，也是离心发散式的综合研究，其对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历史与诗歌观念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体来看，这本书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之前尚无关于“盘峰论争”深入并结合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全面的研究成果；第二，之前尚无以“盘峰论争”作为有效视角来发散式考察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演变史的综合性成果。所

以，周航做的是一个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的研究。可以说，他为当代诗歌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上一些话，除了简单介绍本书的来龙去脉和大致内容之外，也肯定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我对周航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也预祝他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走得更远、更好！

张清华

2013年12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绪 论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正在逐步远离我们，但将其真正历史化尚需一个沉淀、挖掘和整理的过程。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是中国诗歌承上启下的一个关节点，它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影响和意义却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下。我们可以试探性地去回顾与研究90年代以来的诗歌，以探询其影响和意义的有效性。尽管用代际或纪年来考察文学和诗歌仍存在诸多异议，可多年来形成的研究范式与惯性已造就了一种“现实”，由于这种“现实”的沉积，使得我们对这段诗歌历史的研究有着期待并抱有一定的信心。

“盘峰论争”与90年代以来的诗歌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作为世纪末诗界最重要的事件，究其实，它是先锋诗歌写作阵营内部的分裂，所以先锋的特定文学含义又加强了研究“盘峰论争”的重要性。我们除了要弄清它当时的基本状况、来龙去脉之外，还要对它作探源式的研究。十余年过去，回头再看“盘峰论争”，自然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话题。它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偶然的，那它对诗界的震荡为何那般巨大？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它发生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作为论争对立的双方，“知识分子写作”出现在先，“民间写作”出现并与前者发生分野在后。两者从酝酿、确立再到分野，实际上贯穿了整个90年代诗歌观念分化的过程，不仅上接80年代的诗歌存在，同时也下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变化。所以，“盘峰论争”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诗歌事件，以它为中心辐射发散式地来研究整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尤其是诗歌观念的演变，就成为一个有效的视角与行文中轴。当然，“盘峰论争”只是研究的一个切入口，它不能也不应该遮蔽90年代以来更为广阔而庞杂的诗歌“中间地带”或“边缘地带”，这是在进行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

那么，“盘峰论争”究竟是一个什么事件呢？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

馆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这是继199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诗会，也是世纪末甚至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诗会。

这次诗会由谢冕、吴思敬、李青、兴安共同主持。任洪渊、林莽、于坚、西川、王家新、臧棣、杨克、伊沙、侯马、徐江、西渡、小海、车前子、孙文波、陈仲义、唐晓渡、程光炜、陈超、沈奇、刘福春、张清华、刘士杰、章德宁、柴福善、李静、张颐雯、杨少波、彭俐、王庆泉等全国近40位诗人、诗歌理论批评家、编辑到会。

会上，围绕“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的会议主题，两拨诗人与批评家纷纷发表对立性的意见，相互驳斥，言辞激烈，继而形成立场明显不同的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有王家新、唐晓渡、陈超、臧棣、程光炜、西川、孙文波、西渡等，他们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代表；另一方有于坚、伊沙、徐江、沈奇、侯马、杨克等，他们被指认为“民间写作”的主要代表。于坚在发言中对“知识分子写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诗人要关心大地、关心环境、关心日常生活，在自己母语之光的照耀下写作，并强调诗歌写作的原创性。沈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反映了一种文化心态，即贵族的心态。伊沙与徐江主张诗歌界应向公众敞开，诗人应在今天的市场时代谋求生存之道。王家新在发言中为“知识分子写作”进行辩护，他对“日常生活”写作倾向表示质疑，认为任何伟大的诗人都不可能完全和他的时代保持一致。孙文波也为这一观点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与当代语境的变化有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许多伟大的诗人同时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写作也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西渡也反驳了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观点，认为知识并不脱离生命，将利用西方的诗歌资源说成是“买办”是一种强辞。唐晓渡在发言中就“知识分子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中的产物，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诗学命题，关键是它在当代诗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关于

“原创”问题，他认为应谨慎使用这一概念，防止变成一种大而无当的夸耀口实。^①总的来看，论争双方主要围绕语言资源、美学趣味，诗歌经验三大方面的观点分歧来展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书面语写作，追求贵族化审美趣味，持守超越日常经验的人文关怀精神；“民间写作”则强调口语化写作，追求平民化的审美趣，看重日常经验的呈现与表达。“盘峰诗会”作为论争的开端，它发动了整个“盘峰论争”的引擎，揭开了之后更为激烈论争的序幕。

会后，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的诗人、批评家，分别在《北京文学》《诗探索》《大家》《山花》《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文论报》《中国图书商报》《科学时报·今日生活观察》《诗参考》《华人文化世界》《太原日报·文学周刊》《文友》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针对对方的诗学观点与立场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抨击。“民间写作”一方重要论争文章有：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种语言向度》《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诗潮诗歌批评》、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谢有顺《内在的诗歌真相》《诗歌在疼痛》、韩东《论民间》、沈奇《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何谓“知识分子写作”？》、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让争论沉下来》等。“知识分子写作”一方重要论争文章有：程光炜《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争论的回答》、唐晓渡《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西川《思考比谩骂更重要》、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西渡《写作的权利》、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陈超《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蒋浩《民间诗歌的神话》、杨远宏《暗淡与光芒》、桑克《诗歌写作从建设汉语开始：一个场外的发言》、周瓛《“知识实践”中的诗歌

^① 参见张清华：《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载《诗探索》1999年第2辑。又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9年第7期。

“写作”》等。^①

这场诗歌论争被名之为“盘峰论争”或“盘峰论战”“盘峰诗会”“盘峰会议”，也有人戏称之“盘峰论剑”（陈超语），这次论争大约持续到2000年底才渐趋平息。在论争过程中，谢冕、吴思敬、任洪渊、陈仲义、林莽、王光明、张清华、崔卫平、刘福春等评论家发表了较为客观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在论争双方之间起到了某种调解作用。总的来说，整个论争过程参与者众多，不仅在诗歌界激起巨浪，对整个文学批评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朦胧诗”论争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的诗歌论争事件，“同时也势将成为世纪末的一次具有总结与清理意义的重要会议。它既是对20年来新诗潮发展历程的认真回顾又是对新世纪诗歌前途的认真面对，也是对诗歌在当下的处境、情状以及诗人应持的写作立场的认真检讨、辨析与反省。”^②

回顾这次论争，最直接的诱因与导火索有二：一是两种诗歌“选本”的暗中较劲，即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③和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④。后者的编选与出版明显针对前者而来。前者多少带有精英意识的个人行为，后者却有明显群体意识的民间力量。二者之间的较劲由开始的隐性经过“盘峰论争”之后转变为显性，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王家新、孙文波编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与杨克每年一度持续主编《中国新诗年鉴》，对立双方俨然都在构筑自己一方的工事桥头堡。二是双方撰文公开叫板。这种“叫板”从“民间”一方肇始，最早源于沈浩波

① 本书所列篇目仅为一部分。双方重要论争文章主要集中收录于《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1999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等几本书中，在此不一一详列。

② 张清华：《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载《诗探索》1999年第2辑。

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列入洪子诚主编《九十年代文学书系》。

④ 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①一文，后是于坚发表《诗人的写作》^②，再是谢有顺发表《内在的诗歌真相》。^③一石激起千层浪，“知识分子”一方群起而回应，“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臧棣、西渡等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观察》《中国图书商报》和《文论报》撰文，对他们的指责予以反驳，并对1999年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杨克主编、明显是与《岁月遗照》‘对立’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表示了不满。这种‘批评’与‘反批评’，成为一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的敏感的‘导火索’。”^④有意思的是，沈浩波、谢有顺虽然没有参加“盘峰会议”，但由于他们言论的“导火索”作用，在会议上二人却也成为“缺席审判”的对象。此外，1999年5月互联网上出现“诗坛英雄排行榜”，后又被《文友》《华人文化世界》等转载，程光炜认为这“对这场论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⑤

尽管论争有直接的诱因，但纵观20世纪整个90年代的诗歌脉络，二者之间的矛盾隐伏却由来已久，而且这种观念分化的最早根源甚至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诗歌纷繁复杂的范式命名。1989年之后，诗坛经历了短暂平静，又于9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并形成新的诗歌观念，“知识分子写作”成为当时没有太大争议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不少“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身份的明显转变，出国、经典化、学院化、权威化，“知识分子写作”一派似乎成为既有利益的获得者。自1989年他们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从而“知识分子写作”逐渐失效，既有的诗歌秩序出现松动，“民间”一派开始厌恶“知识分子写作”的做派并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各种“权威”诗歌选本的不断面世，于坚、韩东、伊沙等

① 沈浩波该文最早发表于北师大自印小报《五四文学报》上，他时为北师大中文系一名本科生。后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0月30日，又转载于《文友》1999年第1期。

② 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

③ 载《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

④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⑤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有影响的诗人被忽视，“民间”一方不得不进行“话语权力的争夺”^①，所以“‘盘峰论战’并不是什么美学之争”。^②

论争的根源由来已久，论争之后亦余波不尽，最重要的有“龙脉诗会”和“衡山诗会”，诗歌观念有更新更细的表述，诗坛继续分化。这些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分化与诗坛多元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99年11月12—14日，《诗探索》编辑部、《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昌平龙脉宾馆联合主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批评家谢冕、杨匡汉、吴思敬、孟繁华、王光明、张柠、孙绍振等，“民间写作”诗人和批评家于坚、沈奇、杨克、谢有顺、伊沙、徐江等，还有车前子、树才、莫非、杨晓民等在内的40余人参加了此次诗会，而“知识分子写作”一方则集体缺席。“龙脉诗会”就“盘峰论争”及其他一些诗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争与对话，论争文章分别刊载于《诗探索》《山花》《北京文学》《文论报》《文友》等刊物上。这是一次相对平和而且带有反思意味的诗会，正是在这次诗会上，莫非、树才、车前子等人在对“盘峰论争”表示不满的同时又提出了“第三写作”或“单独者”写作的诗学主张，也即后来的“第三条道路”。^③

继之，2000年8月18—21日在南岳衡山举行了“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也称“衡山诗会”。“‘衡山诗会’最有价值的收获在于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内部所发生的诗学观念的分歧与论争”，^④“民间写

① 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② 这是沈奇在“龙脉诗会”上发言的观点。见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第4辑。

③ “龙脉诗会”之后，谯达摩、莫非、树才等诗人编选《九人诗选》，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诗歌观念，为“盘峰论争”后诗歌观念的多元化趋向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④ 谭五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年》，《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作”诗人内部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沈浩波对自己阵营实施瓦解，这种内斗的结果同样昭示了“民间写作”本身内部的矛盾性。次年初，沈浩波与韩东之间发生了所谓的“沈韩之争”，此为“衡山诗会”的延续。事实表明，“意气之争”不仅会出现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民间写作”内部同样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意气与话语权的争夺，而且更显“民间写作”的江湖气、浮躁与功利性。

不过，无论是哪次论争的发生，它们都“是在‘盘峰论争’（包括‘盘峰诗会’以后的一系列诗歌论争）对国内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观念产生全方位冲击的背景下举行的，它意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的诗学命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①正是在论争作用的推动下，“盘峰论争”之后才出现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现象，比如“70后”诗歌的崛起、“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等。我们在考察这些诗歌现象时会发现，它们都受“盘峰论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粗略梳理了“盘峰论争”的“过去”“此刻”与“未来”，基本上可以肯定，“盘峰论争”是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切切实实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还奠定了新世纪诗歌观念多元格局的基础。从而，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梳理90年代诗歌分化的历程，通过它来透视贯穿整个90年代诗歌的历史与新世纪诗歌发展的向度，为后面的论述充分展开一个整整二十年的巨大时间区间。

接下来就“盘峰论争”的研究现状作一个点状的粗略考察，以期探讨研究“盘峰论争”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凡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诗歌者，几必言及“盘峰论争”。不胜枚举之余，可观其共识，即此论争为世纪之交的“重大事件”“标志性事件”。接着，就是对“盘峰论争”作简单的定性、起因与意义的分析，一般而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结论性的东西。对论争的发生学探源，对“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没有作观念史的梳理。大多数停留在以下几个方面：论争只是无谓的意气与权力之争，论争中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倾向或立场是虚构的、根本就是无法去认

① 谭五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年》，《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定的伪命题，承认论争有其必然的原因、也承认对之后诗坛格局产生的影响但没有切实弄清其内在的脉络，把论争中体现出来的美学分歧只是概括为“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或“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的二元对立等。它们都没有对论争作更深层次、全方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不过，对论争中两种立场的纵向梳理的研究倒是出现不少，从微观上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益的资料与见解，然而纵横交错宏观意义上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现今来讨论“盘峰论争”有无意义或反映在其中的问题是否为伪命题已不重要，“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概念成立与否已无关大体，问题是带有这两种倾向的诗歌观念贯穿20世纪90年代，并直接导致了主流诗歌观念的分化，这是客观的事实且不容置疑。那么，“盘峰论争”作为一个关节点，使这两种不同立场的诗歌观念由隐性的对立到显性的冲突，它直接关系到一个时代的诗歌历史的形成，对其进行研究的有效性也将是毋庸置疑的。

对“盘峰论争”最早作出集中性评价的要算论争不久后举行的“龙脉诗会”。谢冕认为论争“说明社会已恢复了常态”，“现在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真实正常的”。孙绍振也持赞同论争的态度，“诗人就应该这样敢骂、敢哭、敢恨，敢于坚持原则”。徐敬亚认为论争的发生说明“现在外部的环境宽松了，矛盾自然从内部发生”。于坚认为，论争中“已经没有了官方意志，没有了朦胧诗时代的意识形态压力”。孟繁华认为论争中两种立场的对立是“伪命题”。另外，张柠、肖鹰、王光明、吴思敬、伊沙等多人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①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就事论事，都是对论争这一事件的表态。这些“表态”在承认论争积极性意义的同时，也附带性考虑到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虽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还没有上升到研究的高度。

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期所发生的文化事件，有论者将之与西方相应时期作了一定程度的对比，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可比性，这也为我们认识“盘峰论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前者的姿态，似乎更近似于六七十年代之

^① 参见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第4辑。

交，欧洲知识分子‘退入书斋，以书写颠覆语言秩序’、以文本作为‘胆大妄为的歹徒’的选择；而后者则选取某种甘居边缘的态度，以文化的放纵与狂欢的姿态挑战或者说戏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斋’间的固守与‘边缘’处的狂欢，正是90年代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的两种最具症候性的姿态。”^① 这种说法虽然是与西方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状况作了一个横向的比较，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论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这种观点同时指出，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双方的身份并无本质的差异，它们都是文化人也即知识分子的带有某种征候性的写作姿态。张清华指出，“盘峰论争”的双方本是亚当与夏娃的关系，本是二位一体的，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他们之间之所以发生争执，只是“身份的幽灵”在作祟。^② 持类似观点的相当普遍，所以不少论者认为论争是伪命题。

论争开始后第二年，《南方文坛》辟出“关于两种诗歌论争的批评”的栏目，发表了张闳、王光明、耿占春、洪治纲四人的讨论文章，^③ 他们的观点对谈论“盘峰论争”事件本身来说较有代表性。耿占春认为论争一开始就不是“对话”而是一种“判决”，是“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判决，最终使论争沦为“一场话语暴力”。他分析了论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在他看来，双方所强调的“本土气质”并无冲突，其差异在于：“民间”一方所说的“本土”带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背景冲突，而“知识分子”一方的本土性“只是寻求修辞与现实关系的策略，是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对中心话语的偏离，也是对真理的诱惑的一种修辞学的偏离”。耿占春言辞之间明显倾向于同情“知识分子写作”一方。张闳与洪治纲指出论争是“权力和派性”在作祟，诗学问题被掩盖和扭曲，是一种“庸俗的谁是谁非”之争，论争中的

① 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② 参见赵丽宏主编：《鲸鱼出没的黄昏》中张清华的言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③ 四人文章分别为：张闳《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王光明《相通与互补的诗歌写作——我看“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耿占春《真理的诱惑》、洪治纲《绝望的诗歌》。

一系列对立范畴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表现出了对诗歌界的失望之情。王光明的态度相对中和，他认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具有互补意义的诗歌话语实践”，而且他通过诗歌史的先例认定这是一种必然现象。从他们的讨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写作”一方在整个90年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惯性。然而不久之后“民间写作”的喧哗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沉寂却又令他们始料不及。这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民间写作”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适时性。但是“民间写作”的泛滥狂欢与自身瓦解，又一次证实了王光明所说的他们之间互补性的客观可能。

吴思敬的“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①、李震的“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的观点则是对论争双方作分类学的贴标签行为。吴思敬的言论是在做一种调和的工作，他以90年代诗歌发展的历程为线索，认为论争双方的立场其实是一种“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的体现，二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补充”，这与王光明的观点类似，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观点。他联系到美国60年代后期艾略特与威廉斯诗歌观念的对峙现象，联系到莎士比亚圣化与俗化的两面性，从而为论争双方开脱，认为这种论争形式不仅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文学界会发生，而且也会发生在个人身上，总之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李震提出“盘峰论争”“实质上是反神话与神话写作的一场公开对垒和最后论战”，它是“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的分野，而且这种状况自80年代以来，“一直贯穿整个90年代”。^②李震的观点极具建设性与远见性，对“盘峰论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视角，他的标签贴得尽管有待争议，但比吴思敬的观点更为合理而有时代性。李震与吴思敬的研究比较客观中和，可由于时间的限制，他们对之前的概括虽然有效，但他们无法对之后的态势作出精准的预测。新世纪之初的诗歌界又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现象，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最近几年的诗坛现状，才有可能对“盘峰论争”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① 参见吴思敬：《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星星》2000年第12期。

② 李震：《先锋诗歌的前因后果与我的立场》，《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604页。

相对于单个论者的自由见解，文学史家对“盘峰论争”的研究显得慎重且又具有综合性质。洪子诚对论争的发生虽然没用“必然”一类的字眼，但却对双方矛盾的由来已久做了不容置疑的定评：“这一诗界的矛盾当然不自今日始。一个明显的征象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诗歌时期与诗歌‘范式’的划分与命名（新诗潮/后新诗潮；朦胧诗/后朦胧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诗歌；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青春期写作/中年写作；北方/南方；北京/外省……），就包含着多种交错、混杂的分歧；诗人之间，不同诗歌社团、‘圈子’之间的矛盾也时有显露。”^①这道出了诗歌史上的一个共性现象，也为世纪末论争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发生学的探源线索。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种矛盾尤为突出，以至到世纪末的关节点不得不爆发，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有文学史把“盘峰论争”说成是“不同文化价值立场”争论的表现，同时也“集中显示了90年代诗歌创作两种主要的艺术倾向”。^②这就把论争提高到文化与艺术的综合立场上来讨论了。还有文学史把“盘峰论争”上升到一个新纪元的高度上来认识，“‘盘峰论争’表明，诗歌的分化已经深入到新诗潮的内部，这是80年代以来诗歌发展演变的结果，也许从此诗歌界的论争不再是一些外部和表面的问题，一个新的起点正在出现。”^③

林林总总对“盘峰论争”的研究与评论，无不指出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性。偏激也好，客观也好，它们已明确了一个事实：研究“盘峰论争”将是有效与有意义的。由此我们也认清了另一个事实：对“盘峰论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还有待后来研究的补充与提高。

所以说，就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之前的研究还相当表层化。对“盘峰论争”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程光炜有很清醒的认识，“就目前来看，如想比较清醒地认识诗歌论争的价值和内在矛盾，还有待时日。但如果放在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长河中看，这场论争毕竟又是90年代文化转型大阵痛的一个诗化的折射，是当代诗人心理情绪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反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诗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②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③ 张健主编：《新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